·历史研究·

DOI:10. 20004/j. cnki. ujn. 2026. 02. 007

日本皇族三笠宫崇仁对侵华战争的省思及其战后意义

龚　娜

[摘　要]1944年1月,日本昭和天皇之弟、皇族三笠宫崇仁在南京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作了题为《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在日本因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陷入困境、实行对华新政策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报告中,三笠宫基于自己在南京的派遣经历,总结了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改进"的新手法。他承认了日本军队的侵略野心和暴行,反思了这些行为如何激化中国的抗日情绪,并对日本对华政策提出了质疑。同时,他赞赏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严明,批评了汪伪政权的腐败无能。虽然三笠宫在报告中对战争暴行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其根本动机仍然是希望通过自省"改进"日本军队的作战方式,以期最终战胜中国。报告虽具有保守性和局限性,未能完全摆脱侵略者立场的束缚,但凭借其皇族身份的权威视角,揭露了战争暴行,特别是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重要佐证,在客观上对官方叙述形成挑战,具有深远的史证价值。

[关键词]日本皇族;三笠宫崇仁;《内省》;战争记忆;历史认识

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长期呈现淡化乃至拒认的倾向,官方叙述与社会舆论多以"自卫""受害"等框架试图稀释加害责任,使历史记忆的形成与传播持续处于扭曲与分裂之中。三笠宫崇仁于战时所作的报告《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以下简称《内省》),基于其在南京的亲身经历,对日本在华暴行及对华政策作出反思,提供了一份极为罕见的皇族内部文本。作为皇族直接记录的文献,它为研究日本在战争中的真实情况及其对华认知提供了重要史料,也在学术界特别是中日关系研究中引起了关注①。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战后日本社会淡化责任的主流叙述,并为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及其后对历史记忆的塑造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2016年三笠宫去世后,其传记《三笠宫崇仁亲王》②于2022年出版,再次唤起了社会对其思想和反思的关注,特别是《内省》在历史记忆中的影响再次提升。尽管国内学界已有学者关注《内省》相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隐秘的皇政:日本皇室与侵华战争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5FSSB006)。

[作者简介]龚娜,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箱:45901669@qq. com。

①柴田紳一:『昭和期の皇室と政治外交』、東京:原書房、1995年版;舟橋正真:「戦時下の三笠宮」、三笠宮崇仁親王伝記刊行委員会編:『三笠宮崇仁親王』、東京:吉川弘文館、2022年版;浅見雅男:『皇族と天皇』、東京:筑摩書房、2016年版。

②《三笠宮崇仁親王》是由三笠宮崇仁亲王传记刊行委员会编写的详尽传记。书中基于严谨的史料,全面记录了三笠宫从1915年到2016年的百年生涯,涵盖他作为军人、历史学者和皇族长老的各个时期,并收录了大量秘藏照片,是研究其生平和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关史料，但研究多停留在原文翻译与内容介绍上[①]，尚未深入探讨其更广泛的意义和影响。本文将通过深入分析三笠宫的南京经历、战争记忆与皇族反思，探讨《内省》如何通过多元视角介入并影响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并为战后历史记忆的重构提供新的线索。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认识，也为中国阐释相关历史提供了具有特殊身份分量的文本证据。

一、三笠宫崇仁与南京派遣

三笠宫崇仁于1915年出生，是大正天皇的第四子。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其长兄裕仁继位为天皇。崇仁比裕仁年幼14岁，1935年成年后，创设三笠宫家，1936年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晋升为骑兵少尉，1941年又从陆军大学毕业并留校研究战史。1943年1月，他被派往中国南京，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对外称“若杉参谋”，以掩饰皇族身份。

此次调任虽由陆军省人事局发出，实则出于其本人强烈请求。据三笠宫回忆，在调任前夕，他主动请求前往战地服役[②]。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在日记中记载：“三笠宫殿下是根据个人意愿调任为派遣军参谋的。”[③]调任前，他曾学习汉语三年，这在当时的皇族中较为罕见，显示出其对中国战场的关注与准备。根据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手记，此次派遣是“以陛下的名义监督对华新政策”[④]，而该政策又是“天皇陛下的亲自决策”[⑤]，可见昭和天皇对此任务寄予厚望。

“对华新政策”全称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华处理政策”，由1942年12月21日第九次御前会议决定。彼时，日军对华战争陷入僵局，既未能摧毁重庆政权，也无法缓解太平洋战场的压力，策反、谍报等间接手段亦告失败[⑥]。于是，日本对华战略由军事征服转向政治操控。在此背景下，重光葵提出，应以汪伪政权为依托，削弱重庆政权的抗日根基，并通过废除治外法权等制度性让步换取对日合作。昭和天皇采纳其建议，新政策明确提出：“以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笔者注）的参战为契机……加强其政治力量，覆灭重庆政权抗日的名义根基，真正实现中国的全新统一，推动战争彻底完成。”[⑦]同时强调：“在英美反攻最高潮来临之前确保成果落实”，并“暂不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⑧]可见，“对华新政策”的“新”，并非在于停止侵略，而是将原有目标包装为“和平统一”，试图通过抬升汪伪政权的政治地位与合法性，在国际舆论与中国民心层面扭转战局。昭和天皇对此高度重视，亲自指派三笠宫前往南京监督政策执行，并要求其定期汇报。

1943年1月9日，重光葵与汪伪政府签署了《共同作战联合宣言》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作为“对华新政策”的首要步骤。翌日，三笠宫在启程赴南京前觐见昭和天皇，天皇特别向他强调了“对华新政策”的重要性[⑨]。因此，三笠宫前往南京不仅仅是以一名军官的身份，更是作为天皇意志的执行者，负责在中国战场推动和落实“新政策”。

1月14日，三笠宫抵达南京，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第一课（作战）任职，负责制定战况报告、

---

①王树才译，邹念之校：《三笠宫“反省”文书》，《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2期；京中：《三笠宫“反省”文书反省了些什么》，《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2期；念辰：《日本发现三笠宫崇仁要求日军对侵华战争进行“内省”的文书》，《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3期。

②中野邦観：「殿下に独占インタビュー『読めなかった中国人の心』」、『This is 读卖』、1994年8月号。

③舟橋正真：「戦時下の三笠宮」、三笠宮崇仁親王伝記刊行委員会編：『三笠宮崇仁親王』、第417頁。

④伊藤隆・渡辺行男編：『続重光葵手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年版、第444頁。

⑤伊藤隆・渡辺行男編：『重光葵手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第439頁。

⑥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下）、東京：原書房、1977年版、第52頁。

⑦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第8巻）、東京：東京書籍、2016年版、第867頁。

⑧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巻）、東京：原書房、1965年版、第580頁。

⑨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第9巻）、東京：東京書籍、2016年版、第8頁。

参与作战会议以及视察各地部队。1月25日,他举办了晚宴,邀请总司令部的部长、课长以上的高级官员参加。在晚宴上,他直接传达了天皇的旨意:“陛下对本次对华处理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特别嘱咐我,今后政策的执行至关重要,请各位务必予以重视。”[①]通过这一表态,他向在座的将领们传递了明确的信息:新政策的落实不仅是军事上的需求,更是天皇的直接指示。后来,三笠宫于2月20日向畑俊六表示:“关于这次的对华新政策,派遣军从总司令官到全体官员都齐心协力,努力贯彻这一政策。我已将此情况书面汇报给陛下,陛下对此表示满意,并特别致词。”[②]

2月24日,东京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会后,首相东条英机严厉指出,大东亚省内部存在未能领会对华处理政策精神的情况,要求严加处理[③]。3月13日,东条英机访问南京,宣传新政策并拜见了三笠宫。东条还向畑俊六转达了皇太后的谢意与关照之托[④]。

在随后的工作中,三笠宫参与了总司令部的作战会议,确认了各地的战斗情况,并多次视察部队。在视察过程中,他传达了“大元帅陛下的旨意”,并向部队强调“务必认真贯彻日本政府的新政策”。例如,9月22日,他在上海向第十三军发表了如下讲话:

> 今年1月初,我拜见了陛下,陛下对新政策的确定感到满意,但我也感受到他对执行的关切……不久前我收到陛下的亲笔信,信中提到“日本的前途在于彻底贯彻新政策,尤其是要赢得中国民心”……在上海贯彻新政策的难度远超其他地区,新政策能否取得成果,关键也在此地。希望各位齐心协力,指导部下及在华日本人,放下私念,努力实现陛下的意愿。[⑤]

三笠宫传达了天皇的意志,并明确指出“新政策”是“最符合天皇心意的”,敦促部队务必贯彻[⑥]。他的讲话不仅表达了对部队执行力的期望,也重申了新政策在当前形势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南京期间,三笠宫不仅监督“新政策”的执行,还亲自收集和分析战地信息,试图评估政策的效果。他观看了日军缴获的重庆政府制作的电影《胜利进行曲》,认为影片的剧情基于事实,无法简单视为宣传片[⑦]。因此,在1943年5月28日他前往东京参加参谋会议时,特意携带了这部电影,希望能向昭和天皇展示。根据《昭和天皇实录》记载,他在5月30日觐见天皇时递交了这部电影,天皇与香淳皇后于6月17日观看了影片[⑧]。

尽管三笠宫在南京期间积极推行天皇的意志,试图为战争寻找解决途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政策的实际效果远不如预期。他坦言:“我的信念在这一年间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可以说,我对所谓‘圣战’的真实情况感到极度震惊。日本军队对无辜的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暴行,已无需一一列举了。”[⑨]三笠宫“完全失去了对圣战的信念”,这种清醒的认识最终促使他将“唯一的追求转向了和平”[⑩]。例如,1943年10月12日,三笠宫回国后会见东久迩宫稔彦王,表达了希望“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展开和平谈判,并寻求东条首相支持”的意愿[⑪]。尽管三笠宫和其他军官在南京驻留期间尽最大努力执行新政策,但他逐渐意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僵局难以通

---

①伊藤隆ほか編:『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3年版、第395頁。

②伊藤隆ほか編:『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誌』、第398頁。

③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下)、第371頁。

④伊藤隆ほか編:『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誌』、第401-402頁。

⑤柴田紳一:『昭和期の皇室と政治外交』、第136-137頁。

⑥三笠宮崇仁親王伝記刊行委員会編:『三笠宮崇仁親王』、第371頁。

⑦三笠宮崇仁:『古代オリエント史と私』、東京:学生社、1984年版、第18-19頁。

⑧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第9巻)、第106-107、124頁。

⑨三笠宮崇仁:「わが思いでの記」、『帝王と墓と民衆:オリエントのあけぼの』、東京:光文社、1956年版、第177頁。

⑩舟橋正真:「戦時下の三笠宮」、三笠宮崇仁親王伝記刊行委員会編:『三笠宮崇仁親王』、第419頁。

⑪東久邇稔彦:『一皇族の戦争日記』、東京:日本週報社、1957年版、第120頁。

过这一政策打破，并最终承认“情况已经无可挽回”[①]。

关于“对华新政策”的实施，正如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所指出，“当时东条首相试图实践大东亚共同宣言，并派遣人员前往现场督促执行。然而，从上海开始，在各地理解并尝试实现这一宣言的人极少。执行阻碍不仅来自陆海军之间的对立、权力欲望和腐败，尤其是作为陆海军经费管理部门，由于不得不在当地筹集物资，急于向中国人征收，无法顾及其他。结果，当地状况并未得到任何改善，共同宣言不仅成为有名无实的空话，反而像是挂羊头卖狗肉，成了反日宣传的好材料”[②]。

总之，三笠宫的南京派遣展现了他在战地执行“对华新政策”的关键角色。作为昭和天皇的弟弟，他积极推动政策的落实，参与作战会议、视察部队，并向部队传达天皇的指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政策难以打破战争僵局，并在反思中对战争和政策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

二、未竟的反思：《内省》的文本分析

三笠宫在中国期间目睹了日军军纪的败坏与野蛮行径。这些经历令其深感震惊，并在战后自传《古代东方史与我》中留下了详尽记录，例如“从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生处听说，为培养士兵的胆量，竟让他们用刺刀扎进活的俘虏”，“观看用卡车将大量中国俘虏运送到荒野进行人体生化实验的影片”，以及“从高级军医处得知，曾计划让李顿调查团食用带有霍乱细菌的水果”等[③]。他将记录这些实验的影片带回日本并呈交天皇，据《昭和天皇实录》记载，1943年10月21日，三笠宫“在晚间觐见天皇与皇后，并在御文库一同观看了他从中国带回的影片”[④]。

这些见闻直接促使三笠宫于1943年末“开始总结他在中国一年的研究”，并计划将其作为教育尉官的材料使用[⑤]。1944年1月5日，他在南京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进行了题为《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的报告。此次报告会有120多名大、中、少尉参加，包括总参谋长在内的多名高级参谋也出席。整场教育活动历时约两小时，内容严厉如“秋霜烈日”，引发“异常的轰动”，并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⑥]。此演讲稿即为后世所称的《内省》文书。

在《内省》中，三笠宫动员日军官佐“反省”他们在华的行径，总结侵华战争中统治和掠夺占领地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改进的新手法[⑦]。通过对《内省》文本[⑧]进行分析，可以大致得出以下要点。

首先，三笠宫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评，明确指出其中的侵略性与霸道主义倾向。在《内省》中，他批评道：“明治维新后，日本人随着引入欧美文化而感染了霸权主义的侵略压榨思想，与欧美各国一起对中国进行侵略，如二十一条要求。”[⑨]他指出，日本不仅吸收了西方科学技术，也未加批判地接受了其侵略性思维，进而推动了对中国的侵略，使日本在亚洲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三笠宫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以后滋长了侮华思想。满洲独立后，日本又对华北怀有

---

①三笠宮崇仁：「わが思いでの記」、第178頁。

②来栖三郎：『泡沫の三十五年：外交秘史』、東京：文化書院、1949年版、第165頁。

③浅見雅男：『皇族と天皇』、第425頁。

④宮内庁編：『昭和天皇実録』（第9巻）、第214頁。

⑤木村辰雄：「南京の若杉参謀」、『週刊朝日』、1952年3月25日刊。

⑥木村辰雄：「南京の若杉参謀」、『週刊朝日』、1952年3月25日刊。

⑦张宪文主编：《日本侵华图志》（第8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⑧《内省》原文主要收录于，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登録番号・支那・大東亜戦争上海南京・二三；読売新聞社編：「三笠宮の“危険文書”発見『支那事変に対する日本人としての内省』全文・付録 綿鉄集」、『This is 读卖』、1994年8月号。中文文本可参考前述王树才译文。

⑨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野心。”[①]他将侵华行为与民族优越感联系起来,认为自甲午战争起形成的蔑视中国心态,推动了后来的华北扩张。此外,他还严厉批评日本在华北的行为,认为“日本军队彻底破坏了华北的中国行政组织,使之成为真空状态,且时间长达五年之久”[②]。这表明,日本在占领期间不仅未能带来秩序和稳定,反而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混乱,摧毁原有的行政结构,导致长期的治理真空。三笠宫的批评不仅针对具体行为,更体现了对政策动因与失败根源的系统性反思。

其次,三笠宫对日本军队的独断专行与战争起因进行了反思。在《内省》中,他认为九一八事变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主要在于前线部队的独断专行。他提到:“满洲事变爆发的第二年,即昭和七年(1932)一月八日,颁赐给关东军的敕诏中昭示:关东军及朝鲜军出兵的目的在于‘自卫’,但实际上当时的出兵,都是当地驻军的独断专行,并不是根据陛下的命令出兵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事变的爆发应被视为一种因双方第一线作战的兴奋所引发的宿命性事件。”[③]三笠宫承认,尽管卢沟桥事变表面上起因于中国军队的“挑衅”,实质上则是日军因战斗中的冒进和失控而导致局势失控。他批评军队未能保持“坚忍自重”,缺乏应有的克制与冷静,从而酿成全面冲突。此外,他还强调:“中国事变本来是从‘自卫’‘维护权益’等利己主义思想开始的。惹起事变的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本身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部队。所以,从作战行动开始时起,就把这些当作作战目的,也就是必然的了。”[④]这一观点揭示了日本军队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侵略倾向,所谓的“自卫”不过是对外扩张的幌子。三笠宫的批评反映了对军队激进行为及背后利己主义思维的深刻反思。

再次,三笠宫在《内省》中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日军在南京“掠夺、强奸、杀害平民、纵火等”行为,已成为“日军暴虐行为”的缩影,也为“抗日宣传提供了依据”,进一步激起了中国社会的反抗情绪[⑤]。虽然三笠宫是在1943年被派驻南京,未曾亲历1937年12月的大屠杀,但他通过亲身观察及报告查阅,对该事件有着明确而坚定的认知。在战后接受采访时,他明确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坚决谴责日军的残暴行径。他举出具体事例,断言:“用极端残忍的手法杀害俘虏,就是屠杀,与人数的多少并无关系。”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当时日本退出了国联,所以产生了可以不遵守国际法的错误思想。”[⑥]此外,三笠宫在《内省》中还揭露并严厉批评了日本军队使用毒气战的行为。他指出:“日本军队在使用毒瓦斯等化学武器时,采取了佯作不知、若无其事的态度。然而,如果重庆方面也仿效日本使用了毒瓦斯,日本却会大肆宣扬这种行为‘卑鄙’或‘违反国际法’等等。”他还批判了决策机构中的一些人所持的“战争的主角是日本,日本必须战胜,所以日本必须榨取中国以自肥”的权益思想,并尖锐地指出,现今的日本已经“无所不取,掠取殆尽”[⑦]。这种批判不仅针对战争期间的具体政策,更是对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思维的深刻反思。

然后,值得注意的是,三笠宫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和民众管理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将其与日本军队进行了鲜明对比。在《内省》中他写道:“中国共产党在男女关系上极为严厉,完全没有强奸等现象。在军纪上也极为严格,日本军队无法与之相比。”[⑧]他进一步详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在薪资与接待制度上的严格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薪资最高薪的是卫生队长,月薪八元;其次是无线电队长,五元;再其次是团长,四元;士兵的最低薪资为一元。另有一份关于外来者接待费用的调

①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②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③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④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⑤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⑥中野邦観:「殿下に独占インタビュー『読めなかった中国人の心』」。
⑦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⑧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查，特点是没有酒和烟草。邻近的团长来访时的接待费用是鸡蛋五个五角和香油四角。请与日本人的薪资和接待费用作比较。”[①]通过这一对比，三笠宫不仅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朴素与严明，也对日军的奢靡与军纪松弛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我认为这样的日本军队根本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抗衡。”[②]他认为，以当时日本军队的状态，无论在纪律性还是道德水准上都处于劣势。如果不加以反思和改革，将难以面对像中国共产党军队这样具有高度纪律性和民众支持的对手。

最后，在《内省》中，三笠宫对汪伪政府的无力统治与失去民众信任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其成立本身便缺乏正当性与政治基础。他写道：“从一开始，国民政府的成立并非是日本真心为了中国好，拯救民众、完成统一国家，而是为了掩盖当时遭到外国批评的日本侵略主义，这更像是一时的权宜之计。”[③]他进一步质疑该政权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又有人认为‘国民政府无力’或者‘国民政府没有吸引力’，这是否是因为它缺乏民众的信任？”[④]三笠宫还批评了汪伪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与虚伪。他指出：“这样的政府，除去高层领导外，其余大部分官吏和军人，或者缺乏真正基于道义的抗战意识，或者试图利用日本来牟取私利，而日本则被他们表面上的亲日言辞所蒙蔽。”[⑤]他强调，许多官员并没有真正的道德意识，他们要么对抗战缺乏信念，要么利用日本的支持谋取个人利益。这种腐败和无能既削弱了政权执行力，也进一步与民众疏离。三笠宫还援引一位日本陆军省官员的反思，称“国民政府的成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战略误判[⑥]。

在《内省》的附录中，三笠宫还收录了自己编写的文化随笔《锦铁集》。这一附录实质上蕴含着延续帝国主义意图的文化统治思想。他将中国人比作“水”，日本比作“铁”，认为中国虽具包容力，却缺乏刚性，而日本则应以“文化理解”引导、规范乃至压制中国，最终达成对中国的有效控制。尽管《内省》中不乏对战争暴行的揭露与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批判，但其反思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方面，三笠宫在《内省》中回避了对天皇责任的追究，将主要责任推向军队。他强调：“满洲事变和中国事变的战斗都不是因陛下的考量或命令而引发的，而是在驻地军队发动战斗之后，陛下才被迫处理后续事宜。”[⑦]这种立场实际上将战争责任从天皇转移到了具体执行的军人身上，维护了天皇的形象，也削弱了《内省》在战争责任反思上的深度与广度，使其批判力度显得不够彻底。

另一方面，在反思逻辑与战争正当性的表达上，亦存在显著矛盾。三笠宫虽对战争结果与军队行为提出批评，但并未彻底否定侵略本身，反而在某些论述中仍体现出帝国主义思维的惯性。他主张：“在大东亚战争的现阶段，应以‘迅速使中国的四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完成近代统一的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派遣军的战争目标。”[⑧]此类表述试图将战争包装为“帮助中国近代化”的“正义行动”，实际上仍未摆脱侵略思维的逻辑。更为典型的是《锦铁集》附录中的“主人与木偶”“医生与病人”等比喻，均强调日本作为操纵者、中国为被改造对象的文化等级结构。这种文化优越论直接表达了日本对中国的控制欲望，并清楚地反映出其隐含的侵略意图。此外，其措辞间亦不乏对中国的轻蔑与侮辱性情绪，进一步暴露出其反思视角中的偏见与局限。

尤需指出的是，尽管三笠宫在《内省》中批评了日本的“霸道主义”，并提倡“王道主义”，但他所推崇的“王道主义”本身仍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这种理念试图通过“推动主义”而非“强拉

①柴田紳一：『昭和期の皇室と政治外交』、第141頁。

②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③柴田紳一：『昭和期の皇室と政治外交』、第142頁。

④柴田紳一：『昭和期の皇室と政治外交』、第142頁。

⑤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⑥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所蔵：「若杉参謀挨拶要旨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登集会所」。

⑦読売新聞社編：「三笠宮の“危険文書”発見『支那事変に対する日本人としての内省』全文・付録 綿鉄集」。

⑧栗原健・波多野澄雄編：『終戦工作の記録』（上）、東京：講談社、1986年版、第80-85頁。

主义”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虽表面更为温和,其本质仍未摆脱以日本为主导的支配逻辑。

综上,《内省》体现了身为日本皇族的三笠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罕见地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他不仅揭示了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种种问题,还严厉谴责了侵略政策及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尽管其批判存在局限,但已展现出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质疑。这种反思本身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历史意义,并对日本战后的历史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内省》对日本侵华战争记忆的深远影响

在探讨三笠宫《内省》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认识的独特影响之前,有必要将其与其他皇族成员在战时及战后所表现出的态度进行对比。多数皇族成员在战争期间均参与了侵略行动,但在战后却选择保持沉默或仅作表面反省。例如朝香宫鸠彦王在南京大屠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下令“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直接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然而,战后他对这一事件予以否认,并始终保持沉默,未作任何反省[①]。尽管在东京审判中受到调查,但因皇族身份最终未被指控,其战时的积极参与与战后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东久迩宫稔彦王曾在中国战场担任重要指挥职务,在战争中表现活跃,但战后却试图通过自我包装为“和平主义者”来淡化其责任[②]。他在回忆录中将自己塑造成反对战争扩张的形象,然而其实际行为与此背道而驰,缺乏真正的自省。梨本宫守正王在战后虽一度被指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并遭拘禁,但最终未被起诉。出狱后,他继续保持沉默,对自身战争行为从未进行公开反思。

与其他皇族成员多以沉默或自我辩护来面对战后的社会反思相比,三笠宫通过《内省》展现出更为深刻的自我批判。三笠宫的反思不仅在皇族中极为罕见,也在战后日本社会引发广泛讨论。以下将对《内省》在战后被重新发现的过程以及其在侵华战争叙述中的独特作用作进一步分析。

1944年,三笠宫离任后,总司令部将他分发的报告作为“危险文书”没收并销毁,并以“有欠妥当之处”为由封锁了相关言论。根据小川哲雄(原拓殖大学专务理事)在其著作《日中终战史话》中的描述,他当时作为陆军中尉,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顾问部工作,曾亲历三笠宫的演讲。他回忆道:“当三笠宫发表演讲时,整个会场寂静无声,显然是因为与会者深感三笠宫对日中事变不道德性的愤怒。演讲结束后,所有人起立致敬,三笠宫离开了会场。随后,总军高级副官满头大汗地提醒不要对外泄露刚刚听到的内容。”[③]显然,当时军部对这些言论高度敏感并严格控制外泄。

直到战后五十年,三笠宫的文书才得以重见天日。1994年,神户大学教授须崎慎一在原陆军大将、前首相阿部信行的遗物中发现该文,并于当年8月刊载于《THIS IS 读卖》“战后50年特大号”。三笠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文书为其所作,并表示:“我认为,无论如何,导致中国抗日的责任在于日本。当时总司令部干部向我讲述了日军暴行,我震惊至极,提出‘必须想方设法结束战争’。当时我只有29岁,若不是身为皇族,说出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恐怕下场远不止‘没收、销毁’而已。”[④]《内省》在沉寂半个世纪后得以公布,不仅在皇族话语普遍沉默的语境中发出罕见的反思之声,也重新唤起了战后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关注。

首先,三笠宫在《内省》中对日本军队行为的反思,引发了同时代人的广泛关注与共鸣。日本原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表示:“三笠宫曾指出,日本人自甲午战争以来就存在‘侮华思想’,这一点应当自省。当时日本人普遍认为‘中国人不如我们,他们作为劣等者反抗我们是不可容忍的’。”随着

①浅見雅男:『皇族と帝国陸海軍』、東京:文春新書、2010年版、第225頁。

②東久邇稔彦:『私の記録』、東京:東方書房、1947年版、第36-42頁。

③小川哲雄:『日中終戦史話: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陳公博の日本亡命』、東京:原書房、1985年版、第33-34頁。

④浅見雅男:『皇族と天皇』、第426頁。

战争的持续恶化，这种充满傲慢与侵略性的思想在当时的媒体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战前的报纸上频繁出现“膺惩”一词，意为以武力惩戒，例如“应当膺惩暴虐的支那”和“膺惩蒋政权”这样的表达。丹羽进一步强调，这种思想在今天的某些媒体中依然存在，历史的阴影尚未完全消散。在撰写《战争的大问题》时，丹羽还采访了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前海军特攻队员岩井忠熊。岩井教授在访谈中表示：“自己已经94岁了，看到日本变成这样，令人感到悲哀。现代日本社会的样子与战前的日本非常相似。”[①]他对现代日本社会中逐渐显现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表达了强烈担忧。三笠宫当年的批判性言论，在战后被重新发现，尤其在那些亲历战争的同时代人中，引发了深刻的共鸣。

其次，《内省》被重新发现后，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评价，进一步凸显了这份文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太一郎指出，三笠宫的思想“明显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认为其在《内省》中表现出了一种“反战”倾向。他强调，作为皇族，三笠宫在日本社会中的历史地位极为特殊，而他在《内省》中所表现出的反战和反思立场，更显示出一种超越时代的进步性[②]。不过，对于三谷的这一判断，学界亦有不同理解。有观点认为，三笠宫的批判虽体现出道义关切，但其出发点主要在于忧虑日军在华失民心、军纪涣散等问题会影响战争整体走向，未必意在从根本上否定战争本身。现代史学家秦郁彦则集中探讨了三笠宫对中国战线军纪涣散的批评，并指出：“当时在中国，军纪涣散的情况的确存在，以至于作为参谋的殿下耳闻了不少丑闻。然而，主要敌人始终是美国，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整个战争时，殿下可能担忧中国战线迟迟无法结束，大量兵力滞留大陆，最终无法获胜。军纪的涣散使得日本军队无法掌控中国民心，可能会对战局产生负面影响。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殿下才发表了那些演讲。”[③]历史学家藤原彰在评论《内省》时指出：“三笠宫抵达中国后，发现现实与他之前听闻的情况截然不同。日本军队在‘圣战’的名义下，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虐的行为。这一现实对三笠宫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他对战争的正义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④]藤原对此深表同感，并认为三笠宫的反思不仅是对日本军队暴行的谴责，更是对整个战争正当性的质疑。这些学者的评价表明，《内省》不仅是对日本军队行为的深刻反思，更是对当时日本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严厉质疑。

再次，媒体对《内省》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报道，引发了公众对历史和战争责任的深入思考。1994年7月6日的《朝日新闻》对《内省》文书进行了专题报道，详细介绍了三笠宫对军部的严厉批评、对侵华战争的深刻反思、对中国抗日活动的认知等[⑤]。这篇报道使三笠宫的观点在公众中得以更广泛传播，也促使社会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皇室记者久能靖表示：“殿下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在当时的形势下，若非他是皇族成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殿下显然非常有勇气。即便对于比殿下年长14岁的昭和天皇来说，尽管他未必完全接受来自中国的这些信息，但作为他的弟弟、在军中服役的殿下所带来的见闻，确实具有倾听的价值。”[⑥]这种来自亲近皇室的记者的评价，凸显了三笠宫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独特地位，以及他在反思战争责任时所展现出的勇气和决心。2016年三笠宫去世后，《朝日新闻》刊登了回顾三笠宫的文章。文章提到：“三笠宫殿下作为军人被派往中国，他对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无知和暴行感到深深的幻灭。尽管身为参谋，他仍然撰写了内部文书，呼吁日本军队进行反省，并明确指出日中战争迟迟无法解决的原因在于日本陆军军人缺乏‘内省’与‘自律’。这份

①丹羽宇一郎：「対北朝鮮政策は、『満州事変の教訓』から学べ86年前、なぜ日本は『暴走』したのか」、『東洋経済ONLINE』、2017年9月18日。

②「特集『三笠宮殿下』百寿祝いで思い出す『紀元節反対』と『南京虐殺言及』」、『週刊新潮』、2015年12月3日号。

③「特集『三笠宮殿下』百寿祝いで思い出す『紀元節反対』と『南京虐殺言及』」。

④藤原彰：「日中戦争と戦後補償」、『法と民主主義』、1995年8月、NO300。

⑤『朝日新聞』、1994年7月6日夕刊。

⑥「特集『三笠宮殿下』百寿祝いで思い出す『紀元節反対』と『南京虐殺言及』」。

文书在当时被视为极具危险性的文件。”[①]这些报道和评论不仅展示了媒体对三笠宫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公众对战争认识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最后，三笠宫的《内省》文书和言论在战后日本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挑战了既有的历史认识与社会观念。三笠宫的言论直接冲击了日本战后长期构建的官方叙述，这些叙述往往试图淡化战争责任，将战争描绘为“自卫”或是外部力量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冲突[②]。他对日军在中国，尤其是在南京暴行的揭露，与官方掩盖甚至淡化这些行为的做法形成强烈反差。他的立场引发了部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们难以接受皇族成员对国家行为的公开批判。同时，三笠宫颠覆了日本战后逐渐形成的“受害者”模式。这种模式倾向于将日本描述为战争的受害者，忽视甚至回避其侵略者身份。通过《内省》中的自省，三笠宫将日本从一个单纯的“受害者”角色转变为需要承担更多战争责任的加害者。他在战时撰写这样一份“皇军自我批判”的文书，并在战后的50年后将其重新公开，无疑震撼了日本社会中那些坚持国粹、反动、保守主义和皇室主义立场的群体。因此，这份文书的公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三笠宫不仅在战时通过《内省》对日本军队的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战后他也继续通过公开发表言论，推动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与讨论。他公开批评纪元节的复活，反对皇室的封闭性，强调开放皇室的重要性，并在多个场合呼吁社会不要忘记关东大地震期间发生的在日朝鲜人虐杀事件，以及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1998年，三笠宫公开表示：“战争期间，我作为陆军将校驻扎在南京，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的暴行，至今仍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想向中国人民道歉。”[③]这一道歉及其战后相关表态，既构成对侵华暴行的公开反思，也在日本社会引发关于皇族成员如何面对历史责任的讨论，并推动公众重新审视战时日本的历史罪责。

综上，三笠宫的《内省》文书在被重新发现和公开后，从多个层面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反应共同构筑了《内省》在战后日本社会中深刻挑战既有历史叙述的重要作用。

四、结 语

三笠宫在南京的派遣经历使他更直接地接触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并促使其撰写《内省》，以个人视角对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作为日本皇族成员，他的反思不仅是对战争的省思，也在一定程度上直面并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加害事实，展现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较为独特的视角。

《内省》虽然存在局限性，但并未削弱其史料价值。它对日本官方叙述形成冲击，通过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和日军暴行的揭露，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提供了不同的内部证言，并为相关研究与公众讨论提供了关键线索，亦因此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与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史料位置。

尤其在当下日本社会右倾加深、历史修正主义抬头、战争责任认识出现倒退的语境下，《内省》所代表的“来自内部、来自皇族”的证言更显稀缺与有力。它不仅能够反驳淡化侵略与回避责任的叙事，也为中国开展对外叙事与历史议题的国际传播提供更具说服力的史料支撑。因而，系统梳理并合理运用这类具有特殊身份背书的材料，对于维护历史真相、巩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记忆秩序，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马晓雪]

①「三笠宮さま逝去」、『朝日新聞』、2016年10月28日朝刊。

②龚娜：《昭和天皇与九一八事变——主要基于〈昭和天皇实录〉的解析》，《南开史学》，2024年第2期。

③「『日本の侵略戦争を謝罪』、三笠宮親王100歳で逝去」、『東亜日報』、2016年10月28日。